

了如指掌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经济发展理论

[美]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 著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江西教育出版社

WESTERN CLASSICS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经济发展理论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rogress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美】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发展理论 / (美)熊彼特(Schumpeter,J.A.)
著;叶华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ISBN 978-7-5392-7274-0

I. ①经… II. ①熊… ②叶… III. ①经济发展—概
论 IV. ①F091.354②F0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5473号

经济发展理论

JINGJIFAZHANLILUN

作者:(美)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出品人:傅伟中
策划:周建森
组稿编辑:万哲
责任编辑:万哲
特约编辑:孙明新
装帧设计: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5
字数:219千字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ISBN 978-7-5392-7274-0
定价:26.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40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永不落架的书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能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早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

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深刻地透视今日。

——编者

目 录

英文版序言	1
第一章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	5
第二章 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	53
第三章 信贷与资本	85
第四章 企业家利润	113
第五章 资本的利息	139
第六章 商业周期	185
译者后记	221

英文版序言

这本书所提出的某些思想可以追溯，远到1907年；到了1909年，所有这些思想和观点都已经整理有序，那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纯经济特征的这种分析的总框架已经形成，而且自此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本书第一次出版是以德文形式，在1911年秋天。在它停止出版10年之后，当时我有些勉强地同意了印刷第二版，我删掉了第七章，重新写了第二章和第六章，并且在文章的某些地方做了缩减和增补。这是在1926年。德文的第三版仅仅是第二版的重印，现在的英文译本也是根据德文第二版翻译的。

如果说，在本书这次再版中，我除了对其评注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改动，是因为我相信原书中每一个论点都是让人满意的，那我将是对本书自第一次问世以来我所做的和所想的做了一个非常有害的判断。尽管我确实认为本书的纲要——或者被称作“观点”——以及本书的结论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我现在有其他的看法。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当经济周期理论第一次提出时，读者可以在第六章找到，我当时想当然地认为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波浪式运动，也就是尤格拉所发现的那种周期。但是我现在相信至少存在三种这样的运动，可能还更多；而且当前经济周期理论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精确地把它它们分开来，并描述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现

象。但是我没有在本书后来的版本中把这一要素引用进来。因为书籍就像孩子们一样，当他们一旦离开父母的家，就成为独立的人了。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而作者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去干预那些离开了家成为局外的人。本书已经开拓出了它自己的路，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它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研究领域中，在德文文献中已经赢得了某种地位。对我来说，看起来最好是应尽可能地让它不受干扰。要不是由于我的受尊敬的朋友陶西格教授的建议和鼓励，我几乎就没有想到要出一个英文版本。

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我没有遵照我的伟大的导师庞巴维克的方式办事，他在他出书以后的版本中，极其细心地关注每一个反对或批评的意见，并加上他自己的评论。而我对于那些对我的论点提出仔细批评的人——这是我所荣幸的事，我却把争论限制到最低限度，这绝不是我对他们缺乏任何尊敬。然而我必须坦言，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即一种在实质性问题上的反对意见，并且这个意见在我看来具有说服力。

很显然，就目的和方法而言，本书是“理论性”的，这里不是作为方法上的一种信仰表白的地方。关于“事实”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我想，或许我现在的想法和1911年有所不同了。但是，我仍然坚信，我们的科学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能没有我们称之为“理论”的那些被提炼了的常识，这些常识为我们考察事实和实际问题提供了工具。不管新的众多的未经分析的事实，尤其是统计上的事实，对我们的理论工具的关系是多么重要——毫无疑问，随着大量事实材料不断增加，新的理论模式也必将不断地被启示，从而逐步地，静静地改进现有的任一理论结构——在任何给定的阶段，具有某些理论知识是处理新的事实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这些事实还没有体现在现存的理论中。如果某个知识是粗浅的而且是下意识的，那么可以说它是一种坏的理论，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理论。比如说，我至今还不能让自己确信诸如利息的来源之类的问题是既不重要也不令人感兴趣的。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些问题，但无论如何，那只是由于作者的过错。但我仍然希望，通过在货币、信贷、利息以及经济周期方面的一些更加“现实”地研究，能够在不久后提供详尽的资料，这些资料正是现

在这里所缺乏的。

本书的论点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这并不是由于事先周密的计划。大约在25年前，当我开始从事利息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时，我并没有怀疑这些课题将会彼此间相互联系，并与企业家的利润、货币、信贷等类似的问题有紧密的联系，而且这些恰好在当时以论点的方式向我表现出来。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清楚，所有这些现象——包括许多次要的现象——都只不过是另一个不同过程所引起的事件，而且将用来解释这些现象的那种简单的原理也会用来解释特殊过程本身。结果表明，这些理论本身对我们是很有用的，并且可以与均衡理论相对应，均衡理论不论是明显的还是含蓄的曾经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传统理论的核心。起初，我用了“静态”和“动态”这两个名词来表示这两种结构，但是现在（遵从弗瑞希教授），我明确地说不再使用这两个词表示这个意义。它们已经被其他的词所替代了，可能这些替代的词看起来有些拙劣。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种区别，因为我不断地发现它们对我现在的研究工作有很多帮助。即使超越经济学范畴，这种情况在其他理论中已经被证实，即我们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理论；这种文化演进理论，在重要的论点上，与本书的经济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区别本身曾经遇到过敌对的批评。但是，如果把日常经营一家公司所产生的现象同新创一家公司所产生的现象区分开来，难道这样真是与现实生活不相符合，或者是人为的吗？难道它同一种“机械的类比”就一定有着某种关系吗？那些对钻研词语的历史感兴趣的人，如果他们觉得应该这样做，倒应该谈到某种动物学上的类比。因为静态和动态这两个词语是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引入经济学的，虽然它们有着不同的含义。穆勒可能是从孔德那里引入的，而回过头来，孔德又告诉我们他是从动物学家德·布兰维尔那里借用来的。

我诚挚地感谢我的朋友雷德弗斯·奥佩博士，他给予了我无可比拟的帮助，承担了这样一种非常难驾驭的原文的艰苦的翻译工作。我们决定删去原版第一章和第三章的两个附录部分，以及其中的一些段落或小节。在某些地方，我们改动了一些说明性文字，好些页数也重新改写了。由于书中的论点

本身没有任何改动，故我觉得做一张更改对照表是多余的。

约瑟夫·A.熊彼特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34年3月

第一章 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1]

社会过程事实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它巨大的洪流中，研究者用其分类之手人为地提取出经济的事实。把一个事实称作经济的事实，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一种抽象过程，这种抽象是在思想上模拟现实的技术条件下，我们被迫不得不做出的许多抽象中的第一个。一个事实绝不会完全是或者纯粹是经济的，总会存在其他的——而且通常是更重要的——方面。然而，我们有同样的理由这样做：在科学中谈论经济的事实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来写一部文学史，尽管一个民族的文学同她生存的所有其他因素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社会事实是（至少直接是）人们行为的结果，而经济事实是经济行为的结果。同时，经济行为可以被定义为人们为了获取物品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谈行为的经济动机，谈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影响力，等等。然而，由于我们所研究的仅仅是那些目的在于通过交换或生产来获得物品的经济行为，因此，我们将经济行为的概念限制在这些获取行为的类型

[1] 这个题目是参考菲利波维奇的表述而选定的。参阅他的《概论》，第Ⅱ编，绪论。

上，而把那更为广阔的领域留给经济动机和经济影响力这些概念，因为，在我们将要谈到的经济行为这个比较狭窄的领域之外，我们还需要经济动机和经济影响力这两个概念。

因此，经济事实这个领域首先就是被经济行为的概念所限定。每一个人都必定（至少部分的）有经济的行为，每一个人都必定要么是一个“经济主体”（**economic subject**德语译为：**wirtschaftssubjekt**），要么是依附于一个经济主体。然而，一旦社会各团体的成员在职业上有了各自的分工以后，我们就能够区分两大类人：一类人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经济活动或者商业活动，而另一类人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行为被其他方面的行为所掩盖。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社会所有其他成员也都必定有经济方面的行为，但经济生活却由一个特殊团体的人所代表。于是可以说，这个团体的活动构成了经济生活，这样说也就不再意味着抽象，不管从这种意义上说的经济生活与人们其他重要的表现之间的一切关系如何。

正像谈一般的经济事实一样，我们也谈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进行解释说明是本书的目的。在提出我们的论点之前，我们在本章将给自己提出一些必要的原则，使我们自己熟悉某些概念上的设计，这些在以后我们是会用到的。而且，我们必须为以后的讨论提供一些工具，比方说诸如“嵌齿”之类的东西，以便掌握公认理论的“轮子”。我完全摒弃了方法论上的评论这个武器。关于这一点，我只想大家能够注意到，本章所说的确实是经济理论主体的一部分，但是在实质上并不要求读者具有今天为论证而必需的特殊的知识。其次，由于只有少数理论上的结论是我们论证所必需的，我很高兴利用这次提供的机会，尽可能不用专业术语而是简单地来表达我所要说的东西，这也不免要牺牲绝对的准确性。但是，凡是当更加准确表述的好处仅存在于那些对我们没有进一步重要性之点的场合时，我都决定采用这种办法。关于这一点，我请读者参考我的另一本书。^[1]

当我们探讨经济现象的一般形式，探讨它们的一致性，或者探讨理解

[1] 《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主要内容》，以下简称为《本质》。

经济现象的关键点时，我们在事实上表明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把经济现象看做是某种“未知的事物”，看做是需要进行研究的东西，需要探索的东西；我们想要探索经济现象的本源，直到相对来说成为“已知的事物”，正像任何一门科学对待它的研究客体一样。当我们成功地发现了两种现象之间的明确的因果关系时，如果起“原因”作用的现象是非经济现象，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作为经济学家在当前问题下所能够做到的事情，以后我们必须让位于其他学科。相反，如果起“原因”作用的现象本身的性质就是经济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继续我们在解释说明方面的努力，直到我们找到非经济的基地，这对一般理论和对具体事实都是如此。例如，如果我能说，地租这一现象是由土地的质量不同引起的，那么，经济上的解释就算已经完成了。如果我能把某种特定的价格运动归结为商业的政府管制，那么，我就尽到了作为经济理论家所能尽到的责任，因为政府对商业管制的直接目的并不是通过交换或者生产去获得实物，因而它不属于我们所说的纯粹的经济事实这一概念范畴。我们总是从事于描述因果关系的一般形式，这些一般形式把经济数据和非经济数据联系起来。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可能的。每一个从事实践的人都知道，经济事件有它们的逻辑性，只不过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准确地对其进行表述。我们在这样做时，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将考虑一个孤立的社会，在这个孤立的社会中，我们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这与在比较复杂的环境下一样，而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事物的本质。

因此，我们将要概述心中所想象的经济机制的主要特征。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主要思考的是一个商业上有组织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私人财产、劳动分工和自由竞争居于主导地位。

如果一个从来没有看到过或听到过这样一个国家的人，观察到一个农民为了一个遥远的城市的面包消费而去生产谷物，他就不禁会问，这个农民是怎么知道城市的消费者需要面包并且恰好需要多少呢？当他了解到这个农民根本不知道谷物在哪儿被消费或者被谁消费时，他一定会大吃一惊。此外，他还能观察到，谷物必须经过一些人的手才能到达最终消费者那

里，而所有这些人也都根本不知道最终的消费者是谁，或许只有最后的面包销售者可能知道最终的消费者。并且，甚至这些销售者在知道这个特定的面包消费者之前，他们通常也必须从事过生产或者购买面包的活动。农民很容易回答给他提出的问题：长期的经验^[1]（部分是继承于他人的）告诉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他应该生产多少；经验教育了他，使他懂得应当考虑需求的大小和强度。他尽可能地维持这个数量，只是在环境的压力下才逐渐改变它。

在农民的核算中，其他物品的持有也是同样的方式，而不管他是像大工业家一样进行完全的核算，或是半自觉地并受到习惯力量的影响来作出决定。在一定的限度内，农民通常都知道他所必须购买的物品的价格，他知道自己必须付出多少劳动（不论他是按照纯粹的经济原理来估计他自己劳动的价值，还是用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眼光来看待他在自己土地上的劳动）；他知道耕作的方法——这些都是从长期的经验中获得的。同样也是从经验中，所有那些卖给他东西的人也都知道他的需求的大小和程度。由于经济周期的“循环流转”——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在所有的经济节奏中——进行的相对而言比较快，并且由于在每一个经济时期都发生基本上相同的事情，所以交换经济的机制以极其精确的方式运行着。过去的经济周期支配着人们的活动——和我们的情况一样——这不仅因为它们严格地告诉个人必须做些什么，而且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每一个时期，农民都必须要么直接依靠前一时期生产的物质产品而生活，要么依靠用这种产品的收入所能获得的东西而生活。此外，所有以前的时期都使他卷入了一个社会和经济的关系网，而这个关系网是他不能轻易摆脱的。它们给他留下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所有这一切把他紧紧地束缚在他的轨道上。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对我们有重大的意义，不久我们将要更加仔细地研究它。但在此刻我们只需要说明，在接下来的分析里，我们将一直假定：在每一个经济时期，每一个人都是依靠前一时期生产的物品来生活——只要生产延伸到过

[1] 参阅维塞尔的《自然价值》，在那里首次提到了这一点，并说明了它的意义。

去，或者，只要一个生产要素的产品继续不停地流动，这就是可能的。我们这样假定，只是为了把表述简单化。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上面农民的这个例子一般化，并且变得更精确一些。让我们假定：所有的人都出售他的全部产品，而当他消费自己的产品时，他就是他自己的顾客，因为这种个人消费确实是由市场价格决定的，也就是说，这是由通过削减对自己产品的个人消费从而获得的其他物品的数量来间接决定；相反，私人消费的数量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的，这就好比说，个人消费的数量实际上出现在市场上一样。所以，所有的商人都与农民一样，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在同一时候既是消费者——为了他们的生产和消费——也是销售者。在这里的分析中，也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工人，也就是说，工人的生产服务可以和其他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东西列为同一类。现在，既然每一个商人——从他自己来看——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来生产产品并且寻找各自的买主，就像我们的农民一样，那么，如果把所有的这些人放在一起来看，情况就一定完全一样了。除去一些干扰因素（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干扰显然是可能发生的），所有的产品都必须被卖掉，因为它们确实是根据经验上所得知的市场消费的可能性而生产的。

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来说明这一点。屠户能出售多少肉，取决于他的顾客，比如说裁缝，将要买多少布并且以什么价格购买来决定，可是，这又取决于后者的经营收入，这种收入又取决于后者的顾客，比如说鞋匠对商品的需求和购买力，而鞋匠的购买力又取决于他所为之生产的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和购买能力；如此这样循环，直到我们最后找到一个人，他的收入来自于将自己的物品销售给屠户。在这个经济完整的体系中，这种数量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随处可见，正是这些构成了统一的经济体系，不论人们选择什么方向走动。不论你从哪儿进入，也不论你从一点走向哪里，可能在你走了很多步但是确定数量的步子之后，你必定还是回到这个起点。这种分析既不会自然而然完全地停止，也不会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因素不是由其他因素决定，而是更多地决定其他因素——而走向歧途。

如果我们不是用习惯的方式来表示消费行为，那么我们的图画将会更加

完整。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面包的消费者，而不是土地、服务、铁等等的消费者。然而，如果我们把人们看做是这些东西的消费者，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各类商品在循环流转中所采取的方式。^[1] 现在很显然，每一类商品的每一单位，并不总是以它的先行者在前一个经济时期内所经历的生产过程那样经过同样的途径到达同一个消费者。但是，我们可以假定，在不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的前提下，这种事情确实会发生。我们可以想象，年复一年地，生产力的永久源泉的每一次重复使用，都是为了到达相同的消费者。这个过程的结果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相同，就像这种事情发生了一样。因此，我们说，在经济体系的某一处，一项需求可以说正在等待每一项供给，并且，在这个体系里，没有哪一处是只有商品而没有它的补充品，这个补充品也就是人们所持有其他商品，人们将会根据从实践上确定的条件，用这些补充品来交换前面提到的该种商品。再根据所有商品都能找到市场这一事实，可以说，经济生活的循环周转就结束了，换句话说，所有商品的卖主又以买主的身份出现，他们购买充足的商品，以使他们能够按照已经达到的水平在下一个经济时期维持消费和生产装备，反之亦然。

可见，各个家庭和厂商都是按照经验给定的数据以及由经验确定的方式来决定其行为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他们经济活动的领域里不发生任何变化。数据可能变化，并且，每一个人一旦注意到这种变化，就会立即按照变化来行动。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尽可能地紧紧地遵从习惯的经济方法，并且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这样，经济体系不会自行随意地发生变化，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和先前存在的状态相联系。这可能就被称为“威泽尔的继续性原则”。^[2]

如果经济体系真的不会自行变化，那么，如果我们简单地假定，它是维持原状的，我们并没有忽视任何对我们现在的目的相当重要的东西，我们这

[1] 参阅A. 马歇尔：《原理》第Ⅵ编，以及他的演说《老一代经济学家和新一代》，对他来说，这个概念起着相同的作用。

[2] 最近在关于货币价值问题的著作《社会政策协会论文》（1909年会议报告）中阐述。

样做也只是为了用理想的精确性表达一个事实而已。如果我们描述一个彻底没有变化的系统，那么我们确实是在做一种抽象，但是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表达实际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质。我们将暂时这样做。这种做法与传统理论并不相矛盾，最多也只是与习惯的做法有些不同，习惯的说法并不能清楚地表述我们的论点。^[1]

通过另一个途径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一个社会在一个经济时期内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总和，可以被称为社会产品。为了我们的目的，没有必要对于这个概念的意义更加深入地钻研下去。^[2] 社会产品本身并不是作为社会产品而存在的。就像经济系统本身也不是一种按照统一计划运行的“经济”一样，社会产品不是系统活动有意识的结果。但是这是一种有用的抽象。我们可以想象：在经济周期的末期，所有个人的产品在某个地方形成一个大堆，然后按照某种原则对其进行分配。由于这个假设不包含对事实的重大改变，所以至今，它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进而，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巨大的社会库藏做出了一种贡献，然后又从它得到一些东西。在这个体系的某一处，对每一种贡献都有着与之相应的另一个人的请求权；并且每一个人的份额都在某处随时准备着。由于每一个人从经验中都知道为了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必须贡献多少（他们已经考虑到每一份额包含一定贡献这个条件）；这个系统的循环周转就结束了，所有的贡献和份额必然相互抵消，不论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分配。到这里我们所做的假设是：所有相关的数量都是由经验给定的。

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方法，我们可以对这幅图画加以精炼，使这幅图画对经济系统的运转提供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假定这种经验全不存在，必须重新构建它，^[3] 就好像同一民族的人民，仍然有着相同的文化、嗜好、技术

[1] 参阅《本质》第二章。

[2] 关于这一点，特别要参阅亚当·斯密和 A. 马歇尔的著作。这个概念几乎和经济学一样古老，大家都知道，它有一段丰富的过去，这使得在使用它时一定要谨慎。对于有关的概念还可以参阅费希尔的《资本与收入》；A. 瓦格纳的《奠定基础》；以及皮古的《优惠关税和保护关税》，在那里皮古大量利用了“国民总利得”这个概念。还可参阅他的《福利经济学》。

[3] 这个方法是莱昂·瓦尔拉所用的。